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张懋镕 主编

青铜卣卷

马军霞 著

科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张懋镕 主编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青铜卣卷

马军霞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卣卷 / 张懋镛主编; 马军霞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03-046614-3

I. ①中… II. ①张…②马…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5404号

责任编辑: 李 茜 曹 伟 / 责任校对: 张凤琴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7 插页: 1

字数: 400 000

定价: 15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编写缘起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工作，多卷本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即将出版。回顾往事，真是百感交集。

30年前，我的处女作《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发表，从那时候起，青铜器的学习与研究注定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29年前，我开始师从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中国古文字有很多分支，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文字。先生告诉我：“你在陕西，陕西有很多青铜器，你就做金文研究吧。”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令我终生受益。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周原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就是从青铜器、古文字、历史文献三方面来研究。从此综合研究成为我研究青铜器遵循的准则与方法。

1989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成立新的专业——博物馆专业，大概考虑到我本科学的是考古，于是把我从文献专业调到博物馆专业。除了继续讲古文字，又开了一门新课“青铜器鉴定”。自此之后，我开始系统研习青铜器，包括没有铭文的青铜器。

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我渐渐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有了新的认识。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自两宋以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百年来研究，在青铜器的分期、分区系、分国别、分器类诸方面卓有成效，为世人所瞩目。

回顾历史，也毋庸讳言，我认为就青铜器基础性工作而言，其资料的整理还远远不够。且提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问题：迄今为止究竟有多少件中国古代青铜容器？（尚且没有涉及兵器、工具、车马器、钱币、铜镜等）几万还是十几万，恐怕连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都没有，专家也说不清楚。家底不清，研究对象模糊，研究很难继续深入。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资料十分庞杂，其收集、整理并非易事，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非常重要。说到研究，比如青铜器的定名，鼎、鬲、簋等各类器物的分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类纹饰的分类研究，纹饰和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各个阶段铭文的特点，器物、纹饰、铭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断代的作用等等，其研究或不够系统，或不够深入，有些方面甚至是空白。

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写了《西周方座簋研究》《两周青铜鬲研究》《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青铜器自名现象的另类价值》等文章，希望从器类、断代、地域、定名等多个角度

和层面对青铜器进行探索。

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国内外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成果，他们的论著是我案头的必备书籍，我经常地反复阅读，受益无穷。

在研究中，我深感个人力量的有限。从1999年招收青铜器方向研究生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构想：如果研究生本人没有更好的研究题目，我就请他（她）来作青铜器中的某一部分，整理、研究某一类青铜器，或某一类纹饰，或某一时段的铭文，等等。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已经完成了20多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分器类的整理与研究完成多半，某一地区、某一时段的铜器的整理与研究正在进行，纹饰与铭文的分类、分时段研究也做了一部分。这些为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编撰奠定了基础。同时，我注意到其他先生也在指导研究生做类似的学位论文，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与帮助。

前几年，在编写《青铜器论文索引》的过程中，与北京线装书局的刘聪建先生多有接触。他听了我的上述介绍后，很感兴趣，遂与我商定，在原有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由我主编，各专题作者分别著述，形成一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线装书局只出了三卷。如今，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得以重新实现，拟在今后的若干年里，陆续完成和出版20卷以上的著作。

写作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目的拟在全面、系统整理青铜器资料，充分吸取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关系等方面作全方位考察和研究，并试图总结出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产生、发展、消亡的基本途径、规律、特点及其原因。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走近它。

由于这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作者都是毕业不久的研究生，眼界有限、文字青涩也在所难免。我的指导也很有限，很多问题我也不懂或知之甚少。当时作学位论文时，我希望他（她）们放大胆子去写，因此他（她）们的观点与我也不尽一致。但无论如何，在阅读他（她）们的学位论文时，在与他（她）们的反复讨论、交流中，我也有很多收获，这是最令人快乐的事情。我将阅读后的感想写出来，作为序言放在书前，就是希望继续与大家讨论，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延续下去。而随着一本本书稿的出版，这一批年轻的作者也正在走向成熟，这或许是比书稿的出版更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要感谢参加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审阅论文的诸位先生，并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批评与帮助。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暨历史文化学院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科学出版社李茜与曹伟两位编辑的辛勤工作，让我们十几年来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乙未年立冬后二日张懋镕写于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

青铜器定名的新方法：组合关系定名法^{*}

——以青铜卣的定名为例（代序）

关于青铜器的定名方法，学界一般认为有三条：第一，有自名的器物要依自名定名。第二，宋代学者依据史籍著录作出的命名。第三，既无自名，又缺乏史籍著录者，可根据其造型、用途予以定名。窃以为还有第四条，即根据器物在青铜器组合中的相互关系来定名。今试以青铜卣的定名为例，来看看这种定名方法有没有道理。

在青铜器器类中，数青铜卣的定名最难。首先是没有自名，什么是青铜卣的标准器，不知道；其次，青铜卣的定名始于宋人，但《考古图》设定的标准并不严格，界限模糊导致后人无所适从，错误频出；再次，在造型与用途上，卣极易与青铜壶（主要指提梁壶）相混淆，究竟哪些是卣，哪些是壶，卣与壶的区分在哪里，长期以来讲不清楚。十年前在指导马军霞写硕士论文《出土商周青铜卣研究》时，面对这个绕不过的问题，并无良策，我也为此而困惑。十年来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斐然，如今在马军霞的这部书稿（以下简称《马著》）杀青时^[1]，终于能比较有底气地回答这个问题了。下面我拟在《马著》的基础上，补充资料，变换角度，对青铜器定名的方法问题作进一步讨论，并祈望得到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一、卣与壶区分的方法与标准

商周金文中有“卣”字，所以我们还是先从文字形体入手来作分析。尽管卣字在金文中有多种写法，但相互间区别不大，基本形态如李孝定所言：“圆底，上像提梁，下其座也。”从字形来看，从西周早期孟鼎铭文中的形，到中期召卣的形、晚期毛公鼎的形，显示卣这种器类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口部较小，颈部较短。二是颈与腹分界不明显，腹部硕大。三是器上有提梁。早期提梁的表现方式可能象形性很强，后来的提梁则用一短线条来表示。有学者认为卣字字形最初像瓠类的果实，由此演绎出的所谓铜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铜觥和鸟兽尊^[2]。这种说法很有新意，问题是铜觥和鸟兽尊的形象距离卣字的形态还是有较大距离，铜觥和鸟兽尊多半是上宽下窄，而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夏商周青铜礼器的兴衰及其原因》（立项号15BKG007）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卣字的形态是上窄下宽，二者并不搭界。

壶的金文形态是𩚑（长佳壶爵，《商周》08263，西周早期铜器）^[3]，譬如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光壶：“光作用壶”，光壶的形制与𩚑字很相像。青铜壶也有三个特点：一是整体修长，与卣的矮胖形成鲜明对照。二是口部与腹部比率小，颈与腹分界比较明显。三是器上没有提梁，这一点也与青铜壶的现存情况接近，大部分青铜壶没有提梁。可见单从字形上说，卣与壶的差别还是明显的^[4]。

《马著》指出：“判断一件器物是壶还是卣，如果据器形判断有疑点，可从组合方面分析”。这是《马著》的一大贡献。因为在商周墓葬中，不同种类的青铜器总是以一定的规则摆放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组合形式，譬如卣往往与尊相配置，即可由此来推断那件与尊同出的酒器是卣而不是壶。组合形式真实地再现了商周时期贵族对青铜卣的性质的认识，所以据此来判断何者为青铜卣，恐怕是更妥当的研究方法。

下面想做一个小小的试验。试验品是商代晚期与西周时期有铭文的而且有明确组合关系的尊与卣（部分例子与《马著》重叠），用来考察一下那件与青铜尊相配置的青铜卣究竟是什么形态，是否与前面我们分析的卣的字形所描绘的卣的形态一致。为什么要选取有铭文的青铜尊与卣呢？因为形制、纹饰一样的器物未必属于同一器主，某些尊与卣，尤其是年代稍早的尊与卣，风格并不相同或相似，只能靠铭文的相同去分析验证它们是否一家。如果尊与卣在装饰风格与铭文方面都趋同，这样的例子最好，更有说服力。既然做试验，当然要求样品越多越好，所以下面将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全部罗列，行文不免冗长，敬请读者谅解。（以下按铭文字数多寡排序）

（1）1901年陕西宝鸡戴家湾墓地出土：鼎尊1件（《商周》11113），鼎卣2件（《商周》12525-26，一大一小），纹饰不同，但铭文相同，出土地点相同，可知是一尊二卣的组合。西周初年器。

（2）1986年山东青州苏埠屯M8出土：融尊1件（《商周》11121），融卣1件（《商周》12563），纹饰不同，但铭文相同，可知是一尊一卣的组合。商代晚期器。

（3）1994年山东滕州前掌大M11出土：史尊1件（前掌大P264），史卣2件（《商周》12631-32），两件卣一大一小，形制、纹饰相同，与尊纹饰不同，但铭文相同，出土地点相同，可知是一尊二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

（4）1990年河南安阳郭家庄M160出土：亚址尊1件（《商周》11212），亚址卣1件（《商周》12647）。铭文相同，可知是一尊一卣的组合。商代晚期器。

（5）1999年河南安阳刘家庄北M1046出土：亚戠尊1件（《商周》11213），亚戠卣1件（《商周》12648），纹饰不同，但二者铭文相同，另外还有1件卣无铭文，但与亚戠卣形制、纹饰相同，唯大小不同，可知这是一尊二卣的组合。商代晚期器。

（6）2004年安阳大司空村M303：马危尊1件（《商周》11236），马危椭圆体卣2件（《商周》12702-03）。纹饰不同，但铭文相同，卣一大一小，符合当时的组合规

则，正好与尊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形式。商代晚期器。

（7）1981年河北正定县新铺商代墓葬出土：□羊尊1件（《商周》11249），□羊卣1件（《商周》12727），尊与卣除了铭文一样，装饰也相同，均饰简化兽面纹，显然是一尊一卣的组合。商代晚期器。

（8）1927年陕西宝鸡戴家湾墓地出土：用征尊1件（《商周》11282），用征卣1件（《商周》12733）。尊与卣装饰一样，素面，仅在颈部有浮雕兽头。虽然不是考古发掘品，根据铭文与纹饰可知是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

（9）2011年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出土：作尊彝尊1件（《商周》11411），作尊彝卣1件（《商周》12875），纹饰与铭文一致，已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

（10）1981年陕西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M17出土：作尊彝尊1件（《商周》11412），作尊彝卣1件（《商周》12876），不仅铭文一致，而且装饰风格一样，在颈部饰两条弦纹及浮雕兽首。西周早期器。

（11）1984~1989年山西曲沃县天马一曲村M6214出土：作旅彝尊1件（《商周》11415），作旅彝卣1件（《商周》12880）。尊与卣不仅高度相同（均为20.4厘米），纹饰都是云雷纹衬底的夔龙纹和浮雕兽首，细部结构也相同，属于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12）1952年河南辉县褚邱出土：珥鬯妇饔尊1件（《商周》11467），珥鬯妇饔卣1件（《商周》12938）。纹饰不同，但铭文相同，是一尊一卣组合。商代晚期器。

（13）1978年扶风齐家村M19出土：作宝尊彝尊1件（《商周》11527），作宝尊彝卣1件（《商周》12965），不仅铭文一致，而且装饰风格一样，颈部均饰夔龙纹。西周中期器。

（14）陕西宝鸡竹园沟M8出土：作宝尊彝尊1件（《商周》11521），作宝尊彝卣2件（《商周》12967-68），不仅铭文一致，而且装饰风格一样，颈部均饰夔龙纹及浮雕兽首。卣一大一小，与尊形成一尊二卣组合。西周早期器。

（15）1984~1989年山西曲沃县天马一曲村M6231出土：伯尊1件（《商周》11503），伯卣1件（《商周》13001）。不仅铭文一致，纹饰也一样，颈部均装饰夔龙纹与浮雕兽首。西周早期后段器。

（16）1971年河南洛阳北窑铁路二中M26出土：登尊1件（《商周》11507），登卣1件（《商周》13008）。铭文相同，是为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器。

（17）1982年安徽颍上出土：马天豕父丁尊1件（《商周》11538），马天豕父丁卣1件（《商周》13039）。不仅铭文一致，而且装饰风格一样，尊是通体光素，卣在颈部仅装饰浮雕兽首。商代晚期器。

（18）1984~1989年山西曲沃县天马-曲村M6081出土：伯尊1件（《商周》11572），伯卣1件（《商周》13059）。尊与卣铭文一样，且装饰华丽，三层满花，颈部均装饰蛇纹，腹部装饰兽面纹。西周早期后段器。

(19) 1972年甘肃灵台白草坡M2出土: 溪伯尊1件(《商周》11595), 溪伯卣2件(《商周》13094-95)。两件筒形卣不仅铭文一致, 且都装饰长冠卷尾凤鸟纹。西周早期器。

(20) 1967年甘肃灵台白草坡M1出土: 泾伯尊1件(《商周》11596), 泾伯卣2件(《商周》13096-97)。两件筒形卣不仅铭文一致, 且都装饰顾龙纹。西周早期器。

(21) 宝鸡竹园沟M4出土: 彊季尊1件(《商周》11602), 彊季卣1件(《商周》13101), 尊与卣的腹部与足的形态很相似, 纹饰(顾龙纹)与铭文相同, 已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形式。西周早期器。

(22) 1980年陕西宝鸡竹园沟M7出土: 伯各尊1件(《商周》11606), 伯各卣2件(《商周》13103-04), 不仅铭文一致, 而且装饰风格一样, 颈部均饰顾龙纹, 腹部饰兽面纹, 有扉棱, 兽角伸出器表, 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形式。西周早期器。

(23) 1997年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 长子口尊1件(《商周》11583), 长子口卣2件(《商周》13153-54), 不仅铭文一致, 而且纹饰一样, 已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形式。西周早期器。

(24) 2011年湖北随州叶家山M27出土: 鱼伯彭尊1件(《商周》11622), 鱼伯彭卣1件(《商周》13159), 尊与卣不仅铭文一样, 而且颈部都饰夔纹, 腹部饰兽面纹。西周早期器。

(25) 1890年河北涞水县张家洼出土: 北伯炆尊1件(《商周》11628), 北伯炆卣1件(《商周》13160)。虽然尊没有器型图, 但二者铭文相同, 出土时间地点相同, 为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器。

(26) 1976年湖北随州安居公社羊子山出土: 曆季尊1件(《商周》11688), 与传世铜器曆季卣(《商周》13202)的风格非常相似, 除了铭文字形书体相近, 纹饰也一致, 均在颈部饰弦纹, 尤其特别的是尊与卣的腹部一侧都有一个鋇, 鉴于有鋇的青铜器极少, 这无疑大大提高了二者为同一组合的可能性。西周早期器。

(27) 1961年湖北江陵万城出土: 小臣尊1件(《商周》11633), 小臣卣1件(《商周》13166)。虽然纹饰不同, 但装饰风格一致, 纹饰的浮雕感强。西周早期器。

(28) 1999~2000年郑州洼刘西周墓出土: 陆尊1件(《商周》11647), 陆卣2件(《商周》13187-88), 不仅形制、纹饰相同(腹部饰花冠龙纹, 装饰华丽), 而且铭文一样。这两件卣一大一小, 与尊相配置, 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形式。西周早期器。

(29) 1984~1989年山西曲沃县天马一曲村M6210出土: 玚尊1件(《商周》11643), 玚卣1件(《商周》13190)。铭文相同, 是为同一组合。另外M6069出土: 玚卣1件(《商周》13189), 虽然两件卣不在同一墓葬, 但相距不远, 大小不同而形

制、纹饰、铭文相同，入葬前应为同一组合，并与尊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30）1989年山东滕州庄里西村M7出土：史鬯尊1件（《商周》11662），史鬯卣1件（《商周》13199），纹饰不同，但二者铭文相同，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

（31）1981年陕西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M15出土：戎帆尊1件（《商周》11682），戎帆卣1件（《商周》13209），不仅铭文一致，而且装饰风格相似，在颈部装饰带状纹饰。西周早期器。

（32）1981年陕西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M15出土：庶父尊1件（《商周》11716），庶父卣1件（《商周》13229），不仅铭文一致，而且装饰风格相近，颈部均饰带状纹饰。西周早期后段器。

（33）1991年扶风齐家村（91FQ）出土：邶尊1件（《商周》11706），邶卣1件（《商周》13235），不仅铭文一致，而且装饰风格一样，颈部均饰两道弦纹和浮雕兽首。西周早期后段器。

（34）1972年陕西扶风刘家村丰M2出土：懋季遽父尊1件（《商周》11731），懋季遽父卣2件（《商周》13248-49）。尊与卣的纹饰风格一样，颈部均饰弦纹，只是卣上多了浮雕兽首。这是一尊二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35）1992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84出土：甬尊1件（《商周》11744），甬卣1件（《商周》13273）。尊与卣的纹饰一样，颈部均饰云雷纹衬底的长尾鸟纹。西周中期器。

（36）1976年长安县马王镇西周铜器窖藏出土：雞尊1件（《商周》11748），雞卣1件（《商周》13277）。尊与卣的纹饰一样，颈部均装饰浮雕兽首。西周早期器。

（37）1984~1989年山西曲沃县天马一曲村M6384出土：𩇑尊1件（《商周》11759），𩇑卣1件（《商周》13282）。装饰风格相同，都没有底纹来衬托，纹饰简朴，颈部均装饰弦纹与浮雕兽首。西周早期后段器。

（38）传1929年河南洛阳马坡出土：作册𩇑尊1件（《商周》11787），作册𩇑卣1件（《商周》13308），除铭文相同外，尊与卣的颈部都饰两道弦纹，装饰风格朴素。西周早期后段器。

（39）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商尊1件（《商周》11791），商卣1件（《商周》13313）。除铭文一致外，装饰风格相同，都没有底纹来衬托，尊与卣的颈部均装饰夔纹，腹部装饰兽面纹。故知为尊卣组合。西周早期器。

（40）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丰尊1件（《商周》11796），丰卣1件（《商周》13316）。不仅铭文相同，尊与卣的装饰风格一致，饰各种鸟纹，尤其是颈部所饰小鸟纹与腹部所饰的垂冠大鸟纹如出一辙，均以细密的云雷纹衬底。虽然不是墓葬出土，也可判断为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

(41) 1969年山东黄县归城小刘庄出土: 启尊1件(《商周》11778), 启卣1件(《商周》13321), 铭文内容差不多, 唯长短不一, 装饰一样, 颈部饰环带纹和浮雕兽首。西周早期后段器。

(42) 1948年洛阳出土: 保尊1件(《商周》11801), 保卣1件(《商周》13324)。两器铭文较长, 而且相同, 重出的几率不大, 应为同一组合。西周初年器。

(43) 传河南洛阳出土: 召尊1件(《商周》11802), 召卣1件(《商周》13325)。除铭文相同外, 据记载都出自洛阳, 装饰风格简朴, 均在颈部装饰一浮雕兽首。西周早期后段器。

(44) 传1929年洛阳马坡出土: 土上尊1件(《商周》11798), 土上卣2件(《商周》13333-34), 除铭文相同外, 尊与卣的装饰风格一致, 纹饰华丽, 三层满花, 且有扉棱。两卣一大一小, 是知一尊二卣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45) 据古录记载“器出洛阳”: 效尊(《商周》11809)1件, 效卣1件(《商周》13346)。除铭文相同外, 颈部均饰顾龙纹, 腹部装饰垂冠大鸟纹。西周中期器。

在上举的45批次的56件青铜卣中, 除了5件筒形卣之外, 51件青铜卣都符合前面我们分析卣的字形时所描绘的卣的形态: 有提梁, 形体矮胖, 短颈硕腹, 盖为母口。这不是巧合, 恰恰验证了我们在前面所作的关于何者为卣的推断是合理的。

有学者指出所谓筒形提梁卣不能算作卣, 它与汉代的鍕相仿, 应命其为鍕, 从卣中排除出去^[5]。如果仅仅从外观来看, 这样说也不是没道理, 问题在于商末周初的筒形提梁卣距汉代河平元年(前28年)鍕的出现, 至少有一千年的时空跨度^[6], 要想说这两者之间有关系, 恐怕很难。其实我们将筒形提梁卣称作卣, 是尽可能地揣摩、体察古人的用意。古人的用意体现在哪里? 就体现在青铜器组合关系中。试看出土的几件筒形卣, 在甘肃灵台白草坡M1中, 两件筒形卣(泾伯卣)与一件泾伯尊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 三件青铜器不仅铭文一致, 且都装饰顾龙纹。更妙的是这两件筒形卣一大一小, 与其他形式的卣的配置方式完全一样。很明显, 在这里, 筒形卣取代了其他形式的青铜卣。无独有偶, 后来在甘肃灵台白草坡M2、宝鸡竹园沟M13中又重复出现。筒形卣数量少, 分布地域窄, 只是青铜卣的一种特例。

至此, 我们可以总结出判断何者为青铜卣的六条主要标准:

第一, 有提梁, 这是必备的条件。从《马著》来看, 也是如此, 凡是归为青铜卣者均有提梁。当然有提梁的未必都是青铜卣, 因为提梁壶也有提梁。而青铜卣与提梁壶的区分, 则可以用以下几个标准来区分。

第二, 青铜卣形体矮胖, 短颈硕腹。相比较, 提梁壶颈部要长些, 腹部要瘦些。

第三, 青铜卣的盖为母口。而大部分提梁壶的盖为子口。

第四, 青铜卣的口部、腹部横截面基本上是椭圆形, 壶的口部、腹部横截面多为圆形。

第五, 就是前面谈到的组合形式, 从尊与卣的稳定组合中去鉴别何者为卣, 何者

为壶。除非有自名，先前要单凭从形制上将二者分别开来，有诸多困难。因为有些器像壶又像卣，不胖不瘦，介于标准的卣与壶之间；至于子母口的问题，有些卣的盖是子口，有些壶的盖却是母口，也不是一个很严格的标准。但组合关系就不同了，什么器物与尊相配置是固定的，它真切地反映出这些器物在古人眼里叫什么名字，具有怎样的功能。

在谈组合关系时，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如果考古遗存出土一对青铜壶，那么这两件壶的尺寸一定相同或非常接近。不妨举几个例子：妇好壶2件（《商周》11999-12000），通高均为50.9厘米，形制、纹饰、铭文相同。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五号墓出土，商代晚期器。伯壶2件（《商周》12109-10），通高均为64厘米，形制、纹饰、铭文相同。1961年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张家坡铜器窖藏出土，西周中期器。秦公壶两件（《商周》12182-83），通高均为52厘米，形制、纹饰、铭文相同。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春秋早期器。曾侯乙壶2件（《商周》12106-07），通高分别为42.5、40.5厘米，形制、纹饰、铭文相同。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早期器。左使车壶2件（《商周》12158-59），通高均为43厘米，形制、纹饰、铭文相同。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战国中期器。无论何时、何地，青铜壶几乎都是以完全相同的一对出现。

相反，如果出土一对青铜卣，那么这两件卣的尺寸一定不相同甚至差距较大，从而形成一大一小的组合形式（从上述所举一尊二卣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两件卣的通高有很大差别）。这已经是考古界的成说了。至此，我们可以用尺寸的相同与否来区分壶与卣。

第六，装饰手法有所不同。包括《马著》在内的一些论著已经指出：壶上装饰十字环带纹，而卣不装饰这种纹饰。我们还要补充一点：绝大部分卣在颈部装饰浮雕兽首，而壶的颈部很少装饰浮雕兽首。

以上六条标准中，第五条最重要。盖是内插式，还是外罩式，虽然也很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组合关系。譬如筒形卣的盖就是内插式，而且形态修长，与壶的形态似乎更近，但从组合关系看，是无法将它从卣类中排除出去的。

若能把握以上六条标准，再去辨别何者为卣、何者为壶就容易多了。

二、对于传世青铜卣的鉴别

出土青铜卣固然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时也要关注传世青铜卣，并发挥其作用。对于传世的青铜卣来说，虽然缺乏出土环境信息，不知道组合关系，但是根据形制、纹饰与铭文的高度相似性，可以判断其是否为尊卣组合，从而知道那件与尊关系密切的酒器是卣而不是壶了。（以下按年代排序）

(1) 鬯尊1件(《商周》11104)、鬯卣2件(《商周》12537-38)。首先需要说说这两件鬯卣。虽然编号12537卣的器物图是手绘,但与12538卣比较,轮廓线与纹饰细部都高度相似,且铭文形态也很接近。耐人寻味的是,12537卣的著录情况与12538卣没有重出现象,说明它们是两件形制、纹饰相同的铜卣。尊与两卣铭文字形书体非常相似,装饰风格也接近,有夔纹与兽面纹,有可能是一尊二卣的组合形式。商代晚期器。

(2) 危耳尊1件(《商周》11246)、危耳卣1件(《商周》12723)。虽然纹饰有差别,但铭文字形书体很接近,又都来自清宫,器物年代差不多,可推断为同一组合。商代晚期器。

(3) 何父癸寤尊2件(《商周》11458-59)、何父癸寤卣1件(《商周》12936)。铭文字形书体相近,不仅有族名,还有私名,又出自同一藏家(刘体智),应为一组器物。商代晚期器。

(4) 母寤日辛尊1件(《商周》11461)、母寤日辛卣1件(《商周》12937)。虽然纹饰有差别,但如果将寤字看做族徽,则这种族徽存世量极少,加上有共同的日名,且都藏于出光美术馆(可能表明器物来自同一地方),所以这两件器物原本应为一组器物。商代晚期器。

(5) 鬯尊(《商周》11623)、鬯卣(《商周》13147)。虽然没有器型,但为同一组合的可能性极高。铭文构成复杂,既有族名,又有致祭者名,还有受祭者名,致祭者的名字少见,同名的可能性不大,况且两器同时为于省吾收藏。商代晚期器。

(6) 何尊1件(《商周》11705)、何卣1件(《商周》13224)。虽然未见何卣的器型,而且何尊有器型而铭文是摹本,有走样的嫌疑,但将尊与卣的铭文字形书体相比较,还是非常接近,所以这一尊与一卣原本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前段器。

(7) 解尊3件(《商周》11698-700)、解卣1件(《商周》13237)。虽然未见解卣的器型,但将尊与卣的铭文字形书体相比较,非常接近,所以这三尊中的某一尊与一卣原本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前段器。

(8) 戈尊(《商周》11179)、戈卣(《商周》12637)。这两器很可能为一组器物,依据是:第一,铭文字形书体相似,且为阳文,在铜器铭文中,阳文很少;第二,装饰风格也接近,戈尊通体光素,戈卣也仅在颈部饰小兽面;第三,两件铜器最初为端方所藏,戈卣据记载出土于陕西凤翔,端方收藏不少来自宝鸡地区的青铜器,而这里也是戈器出土较多的地方。西周早期后段器。

(9) 仲黻尊(《商周》11607)、仲黻卣(《商周》13109)。铭文字形书体很接近,装饰风格一样,颈部均饰弦纹及浮雕兽首,只是卣的纹饰丰富一点,增加菱形雷纹,况且仲黻是私名,不是族名,所以两器为同一组合的可能性极高。西周早期后段器。

(10) 黻尊1件(《商周》11644)、黻卣1件(《商周》13191)。除了铭文字形

书体酷似外，纹饰也极有特点，都饰云雷纹带，将云雷纹作为主要纹饰的铜器很少，所以可以推定尊与卣为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11）岡劫尊1件（《商周》11763）、岡劫卣1件（《商周》13289）。除铭文相同外，尊与卣颈部都饰鸟纹与直棱纹，应属于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前段器。

（12）执尊1件（《商周》11776）、执卣1件（《商周》13295）。虽然尊与卣的铭文都是摹本，且尊的摹本缺字较多，但铭文较特别，重复的几率不大，两相对比，可以推定是一组器物。西周早期前段器。

（13）觶伯尊1件（《商周》11597）、觶伯卣1件（《商周》13093）。不仅铭文一样，而且装饰风格一致，尊通体光素，卣仅在颈部装饰浮雕兽首，应属于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14）羸季尊1件（《商周》11604）、羸季卣1件（《商周》13100）。羸季尊没有器型图片，但与卣的铭文字形书体如出一辙，很可能为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15）伯貉尊1件（《商周》11605）、伯貉卣1件（《商周》13106）。尽管没有器型照片，但铭文字形书体很接近，况且伯貉是私名，不是族名，所以两器为同一组合的可能性极高。西周早期后段器。

（16）盱尊1件（《商周》11641）、盱卣1件（《商周》13182）。虽然没有器型，但为同一组合的可能性极高。除了铭文字形书体极像外，装饰风格一致，都在颈部饰两道弦纹，很朴素。还有尊、卣出在宋代，那时候青铜器毕竟比较少，重复的几率不大。西周早期后段器。

（17）𠄎尊1件（《商周》11668）、𠄎卣1件（《商周》13220）。虽然卣没有器型图，但铭文布局与点画酷肖尊的铭文，而且尊与卣的铭文既有族名，又有致祭者名（有私名），还有受祭者名，致祭者的名字少见，同名的可能性不大，它们属于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18）盩司土幽尊1件（《商周》11720）、盩司土幽卣1件（《商周》13225）。除铭文字形书体相同外，装饰风格比较接近，而且均由同一藏家（刘体智）收藏，所以在西周时期它们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19）卫尊1件（《商周》11669）、卫卣1件（《商周》13222）。两器铭文相同，且都饰云雷纹衬底的长鸟纹，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20）兽尊1件（《商周》11702）、兽卣1件（《商周》13231）。虽然未见兽尊器型，但将二者铭文字形书体相比较，如出一辙，所以这两件器物原本可能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21）夺尊1件（《商周》11703）、夺卣2件（《商周》13233-34）。虽然未见夺尊器型，但将尊与卣的铭文字形书体相比较，如出一辙，所以这一尊二卣原本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22) 许仲秣尊1件(《商周》11740)、许仲秣卣1件(《商周》13267)。这两件青铜器均无器型照片,但铭文字形书体如出一辙,所以这一尊与一卣原本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23) 斂尊1件(《商周》11723)、斂卣1件(《商周》13254)。尊与卣的铭文字形书体非常接近,而且颈部都饰云雷纹衬底的顾龙纹与浮雕兽首,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24) 元尊1件(《商周》11739)、元卣1件(《商周》13270)。虽然未见元尊的器型,但将尊与卣的铭文字形书体相比较,还是非常接近,所以这一尊与一卣原本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25) 否叔尊1件(《商周》11771)、否叔卣1件(《商周》13299)。除铭文相同外,尊与卣的颈部都饰云雷纹衬底的顾龙纹,推定此为尊、卣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26) 遣尊1件(《商周》11789)、遣卣1件(《商周》13311)。不仅铭文高度一致,而且均在颈部饰云雷纹衬底的顾龙纹,这一尊与一卣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27) 作册鬯尊1件(《商周》11788)、作册鬯卣1件(《商周》13320)。除铭文相同外,纹饰的装饰部位一致,仅在颈部装饰两道弦纹与浮雕兽首,两器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

(28) 邢季旻尊1件(《商周》11603)、邢季旻卣1件(《商周》13102)。铭文字形书体十分接近,腹部均饰垂冠大鸟纹,原本应属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

(29) 屯尊1件(《商周》11727)、屯卣1件(《商周》13232)。除铭文字形书体相同外,尊与卣都饰分尾鸟纹与浮雕兽首。虽然收藏在不同的地方,但在西周时期它们属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

(30) 对尊1件(《商周》11708)、对卣1件(《商周》13239)。除铭文字形书体相同外,尊与卣的颈部都饰兽面纹与浮雕兽首,应属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

(31) 述尊1件(《商周》11710)、述卣1件(《商周》13240)。除铭文字形书体相同外,尊与卣的颈部都饰长尾鸟纹与浮雕兽首,应属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

(32) 匭尊1件(《商周》11733)、匭卣1件(《商周》13265)。虽然未见匭尊的器型,但将尊与卣的铭文字形书体相比较,还是非常接近,所以这一尊与一卣原本应属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

(33) 伯尊1件(《商周》11746)、伯卣1件(《商周》13271)。虽然尊没有器型图,但铭文布局与点画酷肖卣的铭文,故推测它们是一组器物。西周中期器。

(34) 次尊1件(《商周》11792)、次卣1件(《商周》13314)。除铭文相同外,尊与卣的装饰风格一致,均在颈部饰长鸟纹与浮雕兽首,应属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

（35）免尊1件（《商周》11805）、免卣1件（《商周》13330）。卣无器型，但尊与卣的铭文很长，有49字，而布局与写法一致，很难有重出者，可以推定为一组器物。西周中期器。

（36）录戣尊1件（《商周》11803）、录戣卣2件（《商周》13331-32）。除铭文相同外，纹饰的装饰部位一致，可见这是一尊二卣的组合形式。西周中期器。

（37）叔尊1件（《商周》11818）、叔卣1件（《商周》13347）。尊与卣装饰风格一致，颈部均饰两道弦纹及浮雕兽首，铭文字形书体也一样，属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

以上我们例举传世铜器中的尊与卣的资料，并指出它们可能属于同一组合。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即只有青铜卣的资料，却找不到对应的青铜尊的资料，有意思的是这些卣的铭文表明它们是由相关联的一大一小的两件卣组成的，所以它们是一尊二卣组合的一部分，虽然少了尊，还是可以推测它们的组合关系。同理，如果我们只看到一件尊，也会想到与它相配的那一件卣。只是因为既有一尊二卣的组合，也有一尊一卣的组合，在有尊而无卣的情况下，判断有几件卣很难，在有两件卣而无尊的情况下，判断尊的多少比较容易，超出一尊二卣的组合毕竟很少。

（1）小子卣2件（《商周》13032-33）。铭文相同，1件无器型图片。1件通高为21.5厘米，1件无尺寸。商代晚期器。

（2）亚卣2件（《商周》12651-52）。形制、纹饰、铭文很接近，1件通高为24.97厘米，1件无尺寸。鴟卣很少，重复的几率不大。商代晚期器。

（3）小臣兹卣2件（《商周》13284-85）。铭文相同，1件无器型图片。1件通高49.2厘米，1件无尺寸。商代晚期器。

（4）賛卣3件（《商周》13261-63）。铭文相同，2件无器型图片，3件均无尺寸记录。商代晚期器。

（5）妇鬲卣2件（《商周》13245-46）。铭文相同，形制、纹饰不同，通高分别为29.5与31厘米，难以推定是否同属一组。商代晚期器。

（6）伯兕卣2件（《商周》13210-11）。形制、纹饰、铭文全同，通高分别为29与39厘米。西周早期器。

（7）鬲卣2件（《商周》13185-86）。铭文字形书体十分相似，无尺寸，可能为同一组合。《商周》定前者为西周早期器，后者为西周中期前段器，其实两器应为同一时期器物。

（8）束叔卣2件（《商周》13164-65）。形制、纹饰、铭文全同，1件通高34厘米，1件无尺寸。西周早期器。

（9）息伯卣2件（《商周》13296-97）。铭文相同，有些字形有差异，1件通高7.5寸（颂续），1件仅存盖，无尺寸。西周早期器。

（10）顓卣2件（《商周》13293-94），形制、纹饰、铭文相同，1件缺失提梁，

高20.5厘米，1件通高27.5厘米。西周早期器。

(11) 亚其矣卣2件(《商周》13150-51)，形制、纹饰、铭文全同，通高分别为9.6与12.5寸(陶斋)。西周早期器。

(12) 向卣2件(《商周》13131-32)，铭文高度一致，无器型与尺寸，西周早期器。

(13) 伯矩卣盖2件(《商周》13107-08)，铭文很接近，无器型与尺寸，西周早期器。

(14) 作父戊卣2件(《商周》13043-44)，形制、纹饰、铭文全同，1件通高为31.9厘米，1件无尺寸。西周早期器。

(15) 庚嬴卣2件(《商周》13337-38)，铭文相同，1件高29.1厘米，1件无尺寸。西周中期器。

(16) 叔卣2件(《商周》13327-28)，铭文相同。1件器型不完整。有局部尺寸，没有通高尺寸。鉴于这种器型十分罕见，所以这两件筒形卣很可能是一组。西周中期器。

(17) 卿卣2件(《商周》13121-22)，铭文相同，通高分别为24、29.5厘米。西周中期器。

(18) 散伯卣2件(《商周》13161-62)，铭文相同，1件有器型，通高26厘米，1件无尺寸。西周中期器。

(19) 仲作好卣2件(《商周》13241-42)，形制、纹饰、铭文全同，1件通高7.4寸(陶斋)，1件无尺寸。西周中期器。

以上整理工作的意义在于：

第一，有可能增加一大批有组合关系的青铜卣资料。由于脱离出土环境，传世青铜卣资料显得凌乱而分散，势必不利于研究，但是通过组合形式分析，找到了联结它与尊之间的纽带，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譬如上举的50件传世青铜卣，都符合前面我们分析出土青铜卣时所描绘的卣的形态：有提梁，形体矮胖，短颈硕腹，盖为母口。殊途同归，从而为证明卣的形制以及区分卣与壶的界限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凡是有尺寸记录者，都可以发现这两件卣的大小一定是有区分的。

第二，有助于更好地判断器主的身份地位。从一件青铜器与一组青铜器来分析器主的身份地位是不同的，尊卣组合往往出现在中型以上的墓葬中，它们的主人是中等以上的贵族。

第三，对于断代的意义。传世青铜卣和尊由于缺乏出土环境资料，给器物断代造成先天的欠缺，如今找到了尊(或卣)的另一半——卣(或尊)，多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缺陷。譬如单看尊或卣的时候，由于特点不明显，难以下结论，如果再看它的另一半——卣或尊，可能获得更多更清晰的印象，有利于断代。试看下面的例子。

(1) 以卣为参照，判断尊的年代。总的来说，尊的变化轨迹不如卣明显，如果能参照卣的特点来反观尊的话，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譬如召尊(《商周》11802)，